



Københavns Universitet



Jensen, Klaus Bruhn; Liu, Jun; Zhao, Hui

Published in:
Dongnan Xueshu

DOI:
[10.13658/j.cnki.sar.2015.01.024](https://doi.org/10.13658/j.cnki.sar.2015.01.024)

Publication date:
2015

Document version
Også kaldet Forlagets PDF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Jensen, K. B., Liu, J., (TRANS.), & Zhao, H., (TRANS.) (2015). . . *Dongnan Xueshu*, (1), 196-203.
<https://doi.org/10.13658/j.cnki.sar.2015.01.024>

三重维度的媒介：传播的三级流动

[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著
刘君 赵慧 译

摘要：本文旨在建构一个研究数字媒介和网络化传播的理论框架。一方面，本文区分了三重不同维度的媒介：使面对面传播活动得以实现的人的身体；大众传播的技术性再生产手段；以及催生网络化传播的数字技术。另一方面，本文强调了贯穿于三重维度的媒介中的多级传播活动。不仅是数字媒介，大众传播和具身的社会个体也参与并建构了复杂的网络化传播实践。而随着网络化传播形态的发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经典的、衔接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二级传播模式，进而就三重维度的媒介之间以及跨越媒介平台的三级传播展开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络；数字媒介；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三级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5)01-0196-08

DOI:10.13658/j.cnki.sar.2015.01.024

一、导论

纵观媒介与传播发展的历史，一个核心的启示是，新兴的传播技术与制度时常给“媒介”与“传播”这两个词注入新概念(Simonson, Peck, Craig, & Jackson, 2013)。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包括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崛起才推动了“传播”这一概念的建立，并进而成为一类基本的、内涵丰富的人类活动(Peters, 1999)。这些发展使得学术界以及其他行业与一般公众开始思考多样化的传播活动——无论是亲身参与、通过有线电视或是无线电波——看作一种现象的不同表征。美国传播学者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1999: 6)用一句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上述所言的“传播”这一概念的产生过程“大众传播首先出现”。在数字化的浪潮影响下，尤其是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传播的观念再次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学界始终致力于探寻大众传播时代之后将会是一个怎

编者按：本译文已获得作者授权翻译和刊发。原文收入于 Monica Murero 和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 编著的《互联网络理论：推进互联网络研究的理论路数》(暂定书名) 将于 2015 年出版。

作者简介：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教授、数字媒介与美学研究方向责任教授、传播与计算中心主任。

译者简介：刘君，哲学博士，文学博士，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助理教授；

赵慧，瑞典隆德大学战略传播系博士研究生。

样时代。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建构一个双重的路数(two-pronged approach)以回答上述问题(Jensen, 2010, 2012)。一方面,我提出一个包含三重不同维度的媒介的理论框架。这三重不同的媒介是:使面对面传播活动得以实现的人的身体;大众传播的技术性再生产手段;以及催生网络化传播的数字技术。过去,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往往将大众传播研究与人际传播研究相互割离(Rogers, 1999)。直到近几年,第一代的“新媒介”研究仍将网络空间与虚拟现实视为是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事物(相关的批判性讨论,可参见Slater, 2002)。现在看来,数字化和互连网络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我们得以整合以技术为中介(technologically mediated)的传播活动和“无需中介的”(non-mediated)传播活动、线上和线下交流所隐含的对立观念,并进而发展新的研究议程,以探究不同物质和制度平台之上的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传播活动。

另一方面,我强调了贯穿于三重维度的媒介中的多级传播活动。不仅是数字媒介,大众传播和具身的社会个体也参与并建构了复杂的网络化传播实践。早期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已经对上述复杂的传播流动进行了描述,尤其是衔接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二级传播”理论(Katz & Lazarsfeld, 1955; 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1944)。随着数字媒介和网络化传播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就三重维度的媒介之间以及跨越媒介平台的三级传播展开研究。

二、三重维度的媒介

1. 身体和工具——第一维度

从历史学和传播理论的角度而言,人类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媒介。人的身体是一个多功能的物理平台,它可以实现包括演讲、唱歌、舞蹈、戏剧表演、绘画和艺术创造等在内的活动。藉此,人的身体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类充分且必要的传播物质条件:通过社会化以及文化涵化,我们的身体进而成为兼备生产性与接收性的传播媒介。相较而言,如书写用品或演奏乐器之类的工具则显得既不必要也不充分,它们仅仅只是显著地拓展了人体机能及其传播能力(McLuhan, 1964)。第一维度的媒介(media of the first degree)——人的身体以及它们在工具中的延伸——不仅将现实与可能的世界具象化(externalize),而且赋予我们每个人彼此交流与传播的能力,以实现思考和工具性目的。

纵观人类发展的大部分历史,吟游诗人和故事歌手是唯一出现的媒介形态;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单一的、地区性的信息档案和文化遗产的传播手段。针对原始社会和史前社会的研究文献多将口头文化描述为“情景约束的”(context-bound)和“现实取向的”(present-oriented)(Goody & Watt, 1963; Ong, 1982; Scribner & Cole, 1981)。原始口语(primary orality)——一种“不受任何书写或者印刷知识影响”的文化形态(Ong, 1982: 11)——无论是和历史过往的意味或不同的未来的意味都格格不入。这一观点与翁(Ong) (1982: 11)在论述广播语言时使用的“次生口语文化”(second orality),以及在描述数字媒介体裁时使用的“第三阶层口语”(a tertiary orality)形成鲜明的对比。

基于上述讨论,我将书写(writing)划分至第一维度媒介的范畴。诚然,手抄本不仅实现了信息到知识的转变,而且通过阅读与反思的流通循环过程生产出更多的知识,由此塑造了千年以来广泛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科学体系。然而,作为传播实践的一部分,手抄本的流通仍然依赖于其他社会交往活动。这是因为手抄本往往珍贵而且稀少,它们大多只是提供给特定机构中的核心成员。这些核心成员,例如神父、宗教团体的领袖、公务人员等等,再将筛选过的信息连同他们的口头评论一起,在特定的、组织化的等级制度中传播。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等级

制度不仅局限了公众接触信息的机会,也深刻影响了公众的文化素养——历史上的情况正是如此。另一方面,由于手抄本的复制不仅费时费力,且不免产生纰漏,这也影响了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因此,在誊写的文化环境中,传播仍然是一种由具身的社会个体(embodied individual)所承担并实现的、囿于本地语境的表达与事件。即便是在一个乌托邦国家,它鼓励并在经济上支持其子民习得读写能力,而且向民众提供充足的手稿,但这一过程仍然需要耗费大量的纯劳动力,从而使得均等地获取文化上可用的信息(culturally available information)变得不可能。就此而言,书写媒介并不具有大众传播的能供性(affordance)(Gibson,1979; Hutchby,2001)。

纵观媒介理论的发展,诚如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1994:54)所指出的,复制与散播过程的相对低效率,使得书稿只可能成为一种“过渡的文化形式”(a transitional cultural form)。尽管如此,书写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书写是教育过程、起草政治草案、管理决策与学术研究文本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也是沟通亲友、或通过笔记与自我对话必不可少的方式。作为一种记录的载体以及在社会中主要机构之间以及机构内部交流的载体,具身化的社会个体和书写文本逐渐被第二维度的媒介所取代。

2. 技术——第二维度

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我们谈及“大众传媒”,仍普遍地将它们视为是一小群的传播者为中心,向广泛的受众群体发布相同或相似的信息的媒介。众所周知,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77/1936)从复制与扩散的技术角度对大众传媒进行了定义。本雅明的论述虽然仍主要围绕艺术作品,但也隐射了其它的传播活动。然而,本雅明将重点放在了摄影术、电影和广播上;而在我看来,门类众多的模拟技术——印刷书籍、报纸、电影、广播和电视——都可以被囊括进第二维度的媒介的范畴。因为它们都属于一对多的媒介机构与传播实践。这一类型的媒介具有两个普遍特征。第一,它们实现了对于特定文本的一对一的复制、存储和呈现;第二,它们从根本上拓展了信息在时空中扩散与获取的潜能,并不再受限于参与者在场与否和数量多寡。

本雅明关注到复制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模糊性”(ambiguity)。在他看来,一方面,这种模糊性造成了艺术作品的“灵晕”(aura)的丧失。这种灵晕包含了如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家的演出所具有的独一无二性,以及通常有可能包含其间的“先验性”(transcendence)。在场的艺术品或卓越的演员呈现了一种缺失的实在,因而具有了超越生命的意涵。(第一维度的媒介——任何的社会个体——可以说都拥有灵晕。灵晕既可以从传记或经历中体现出来,也可以从与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的邂逅瞬间觉察出来。当然,上述这些都并非是本雅明的原意。)

另一方面,技术的复制性体现了一种重要的文明的进步。当艺术品和其他文化产品与其自身的唯一性与本地性剥离之后,它们就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用途。复制技术进而引发了对于艺术的理解的变化,即从单一表达到社会交流。籍此,本雅明总结道(1977/1936:390f.),艺术自此不再是宗教或其他仪式的附属品:

“……[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仪式的依赖中解放了出来。很大程度上艺术复制成为了为复制而生的艺术。……艺术的整体功能得以改变。它不再建立仪式之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之上——政治。”

“可复制性[的艺术品]的设计”(designed for reproducibility):这句话意味着复制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带有特定的社会意涵的、有计划的行为。书籍、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品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必要(尽管绝非充分的)条件(Eisenstein,1979)。与此相应,报纸在政

治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物质载体的角色(Anderson, 1991; Habermas, 1989/1962)。印刷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公共的传播平台,并具有一种不受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所支配的潜在性。在此影响之下,印刷品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与政治的理解,即,宗教是一种私人事务,而政治则是一种公共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多级传播仍是印刷文化及电子文化中的主要特征。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任何历史与文化时期,接触并阅读印刷材料仍然受到经济因素、知识文化素养以及生活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作为社区活动的阅读——大声朗读——依旧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Boyarin, 1992)。安德鲁·佩蒂格里(Andrew Pettigree)(2005)对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isenstein)(1979)对宗教改革中的印刷出版物和书籍的研究展开了批判与发展,他阐释了阅读的过程与宗教的皈依是如何成为公共活动,如演唱、论道、戏剧以及视觉符号等等。不仅如此,读者本身也可以成为作者,在书本的页边空白部分陆续添加评述或者“旁注”(Jackson, 2001)(这类似于数字媒介的使用者标签功能),并摘抄其中的内容,以用于此后的通信之中。对于广播听众而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的接受研究呈现了受众不仅积极地参与到对媒介文本的诠释活动中,而且还共同将媒介建构成为传播实践的一部分(Lull, 1980; Morley, 1986; Radway, 1984)。因此,面对面交流和大众传播活动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数字媒介的出现则为这种关联与网络提供了新的物质平台。

3. 元技术——第三维度

数字计算机不仅复制了先前所有的表征与交流的媒介的特征,并将它们重新整合于一个统一的软硬件物理平台上。在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开端,艾伦·凯(Alan Kay)和阿黛尔·戈德堡(Adele Goldberg)(1999/1977)将计算机描绘成元媒介(meta-media)。数字媒介将文本、图像和声音整合于许多新兴的和既有的表达类型之中,如叙述、争论、游戏等等,这些类型则源自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同时,作为交流的模式,数字媒介整合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传播形态。第三维度的媒介的典型例子即网络化的个人计算机。自2000年以降,手机和其他便携设备已经成为了可以接入互联网络的同等重要的终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手机和其他便携设备甚至对互联网络的扩散起到可主导作用(Castells et al., 2007)。

在元技术的影响下,传播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中的互动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的特征。例如,手机的普及使得以技术为媒介的交谈活动(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speech)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通过手机协调公共事件或私人活动。网络游戏则进一步整合了多元化的听觉和视觉形态。这种整合不仅仅意味着虚拟游戏世界中的光影声色,它还体现于游戏操作中的团队协作配合,如不同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持续开展的语音交流(Jørgensen, 2007)。此外,某些特殊的非现实世界中的虚拟存在感有可能形成现实中的公共事件的参与感。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为纪念“9·11”事件而建造的“声音纪念工程”(the Sonic Memorial project)。该工程除了呈现世贸中心大楼周边的声音,还包含了交互功能,这种功能可以让来访者“添加声音”。(<http://sonicmemorial.org>, 访问时间2014年2月24日)(Cohen & Willis, 2004)。

互联网络将学者的研究视线从媒介重新回到传播,进而审视并梳理两者之间的联系。一种物质载体能够实现多种不同的传播实践;而一些传播行为则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媒介载体上。当新的媒介平台产生时,某些先前存在的传播活动会再度出现并移植到新的平台上,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手机短信息(SMS)。在下一节中,我将讨论在三重媒介平台上不同传播活动的多级流动。

三、三级传播

媒介与传播研究发展成为一个领域始于二十世纪中叶,这一发展部分源于人类希望更多地了解印刷和广播媒介的社会使用与结果。一项早期的研究发现,媒介对于社会大众的态度和行为仅有极其有限的影响力;这一结论与绝大多数当代的假设大相径庭。相反,媒介是以一种二级传播的过程,先影响对少数的“意见领袖”们,这些意见领袖进而通过对话与其他人际传播方式影响他们亲近的社会关系(Katz & Lazarsfeld,1955; Lazarsfeld et al.,1944)。尽管围绕这一研究发现仍存在争议(Gitlin,1978),但二级传播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使得我们能够更加细致地将大众传播理解为一个包含着多层面影响的多步骤过程。

尽管二级传播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令人吃惊的是,媒介与传播领域依然存在着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彼此割裂的现实(Rogers,1999)。而这一点恰恰对于当前的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发展形成了反作用力。在此,我将存在于互联网络社群、社交媒体网站、手机信息以及其他尚未想像或发明的传播形态总结为多对多的传播,并将其整合入一对一和一对多的经典二级传播模式。藉此,第三种类型的网络化传播以及三级传播构成了当代媒介环境的重要内容。

表一列举了一系列重要的传播活动以及它们与第一、二、三重维度的媒介彼此间的联系。表格的纵向依据传播活动参与者的人数进行了区分。本质上而言,即有多少人向多少人实施了传播活动?每一种传播实践都在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以及人际传播中都存在着具体的实例,而上述每一类型的传播活动也都有者各自的原型,并与特定的物质或技术能供性和制度框架密切相关。而表格的横向则区别了第一、二、三维度的媒介。表一依据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总结了当代的媒介环境(Jensen,2008),并强调了产生这一媒介环境的不同媒介类型和不同传播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 1 不同媒介类型的传播活动

交往与传播活动	媒介类型		
	第一维度的媒介	第二维度的媒介	第三维度的媒介
一对一	原型 面对面交流、书写	电信、电话与传真	电子邮件、短信、即时通讯、IP 电话
一对多	书稿、戏剧、雕塑、建筑、音乐作品	原型 书籍、报纸、广播、音视频记录	Web 1.0/网页、下载、流(大众)媒介
多对多	壁画、游戏、涂鸦、公告栏、集会、市场、体育馆	社区媒介、公共广播与电视、电话聊天服务	原型 Web2.0/维基、共享文件网站、在线聊天、大型多人在线游戏、社交媒体网站、博客、竞拍网站

当前,上述传播原型的框架以及不同维度的媒介之间的传播流动正变得愈加重要。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三级传播(以及二级传播)活动中,各级步骤并不均等。二级传播(Lazarsfeld et al.,1944)并不仅仅由不同的传播步骤构成,而且包含不同的传播类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间,新闻主播与政治评论员向听众播送新闻或评论是一种传播实践;而听众——无论是否为舆论领袖——与身边的一位或多位社会个体讨论他们喜爱的总统候选人,这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传播实践。同样的,下述两种传播情境也截然不同:其一,A 在街头告诉 B 一件事情,而 B 稍后又与 C 在家庭或工作场所谈论起此事;其二,A 收听广播新闻节目,随后就其收听到的内容与 B 和 C(或许更多其他人)参与到一个多方、多级的在线交流中。并非所有的传播步骤都

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我们当前的讨论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许多科学研究和公共讨论均强调了多对多的在线传播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中一种新的公共参与形式的潜能。在就上述潜能或实践提出异议之前,我们需要以理论的方式澄清不同传播步骤和流动的本质,并就其细节展开实证研究。为了探究上述问题,研究审视了关于网络媒介和多对多传播有可能在新闻站点与论坛上推动更加多元的政治信息和更多非政治的政治讨论的假设。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表明,就上述两方面而言,新媒介并未给既有的传播实践带来翻天覆地的彼岸花:传统的媒介依旧占据着信息提供者和议程设置者的重要角色(如 Himelboim 2010; Meraz 2009),博客也并未推动市民之间的对话(如 Kenix 2009)。对话仍然“也许只是两个人轮流面对彼此说话”(Peters, 1999, p. 264)。

与此同时,关于新媒介和类型的理论发展也开始强调我在这里提出的三级传播,并立足于一系列经典的讨论——如社会中信息的扩散、政治议程设置和传统的二级传播——重新思考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的流动(Brosius & Weimann, 1996; Campus, 2012; Himelboim, Gleave & Smith 2009; Vu & Gehrau 2010)。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些传播的流动生产并维系着社会与文化。如果说用户和信息是传播的节点(nodes),那么用户与传播共同建构的语境则是更为广义上的社会交往和制度的网络的节点。在这里,语境可以被视作是具体的场所——它同时兼备物理性和话语性——用户与信息则在其间彼此关联并展开互动。

为了具体阐释上述论及的语境,我们有必要就如下不同类型的流(flow)进一步加以区别:

* 信息流。类似于一个广播频道(Williams, 1974),任何互联网站都可以被视作是一种信息流;从广义上而言,这种信息流包括了虚构叙事和娱乐体裁。与广播新闻和系列剧类似,互联网络上的文本也取材自真实生活和文学素材,并由此而产生形形色色的线上或线下对话。与先前的模拟媒介不同,数字网络从技术、话语和制度层面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信息流整合于一个大范围的交流语境。

* 用户流。用户存在并流动于所有可用与可及的媒介形态中;与此同时,用户彼此也扮演着具身化(embodied)传播的媒介。互联网络不仅实现了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交往,而且还允许用户在某一环节上或某一个时间点展开跨越媒介平台的流动。除此之外,移动技术使得用户可以在不同的传播语境中穿梭。数字媒介的使用更进一步预见除了口头交谈之外传统的印刷和广播媒介的使用。

* 语境流动。移动媒介(mobile media)研究着眼于语境流动性的重要性(Kakihara & Sørensen 2002)。移动传播(mobile communication)中的移动这个词跟信息、用户和技术的关系并不密切,而与上述三者共存的语境有着紧密联系(Jensen 2013)。在移动传播中,无论传播者在场与否,他们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格局都处于变动之中。一个文献中经常被引述的例子是在不同的国家语境下运用手机组织抗议活动(Jenkins 2006; Rheingold 2002):短信息让人们走上街头抗议。而参与者在与彼此交流和权力对话的同时,也通过移动媒介(如手机)与不在场的朋友们继续着对话和交流。

伴随着第一、二、三维度的媒介的普及和传播实践的丰富,上述这一系列传播流动构成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媒介与传播研究的核心挑战之一。数字媒介环境尤其亟需理论的发展以指导实证研究和政策制定。手机媒介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普及(Ling & Donner 2009),加之日常生活交流中普适计算(ubiquitous and pervasive computing)的全面渗透(Greenfield 2006),再一次向我们提出了如何界定与研究“媒介”和“传播”这一核心问题。

四、结 论

互联网在挑战了现有的、建立于大众传播这一观念之上的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来重新审视这个领域中的一些基础性概念,并重新发展了现有理论和方法论,以适用于研究在当前技术和制度变迁的环境下传播活动的需要。在经历过对网络空间和虚拟现实的早期沉迷之后,媒介与传播研究日益意识到线上和线下交流的相互依赖,以及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传播的彼此联系。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理论的框架,以理解并审视上述的一系列相互依赖性。当我们只是着眼于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的变迁时,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人类自身作为具身化媒介,作为以技术为中介的传播活动的原型和参照,以及作为数字媒介环境中的一个必要的构成。与此同时,传播可以被视为一种多级的流动,这一观点超越了早期整合大众传播和人际对话的二级传播。拥有了移动媒介之后,今天的用户时常同时处在远距离的交流和新的社会行动语境的建立之中。人类运用三重维度的媒介,展开三级传播活动,参与到社会的生产、再生产和结构化过程(Giddens,1984)。

参考文献: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2nd ed.). London: Verso.
- Benjamin, W. (1977).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 J. 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 Boyarin, J. (Ed.). (1992). *The Ethnography of Rea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osius, H.-B., & Weimann, G. (1996). Who Sets the Agenda? Agenda-Setting as a Two-Step Flow.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5), 561-580.
- Campus, D. (2012). Political Discussion, Opinion Leadership, and Trus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1), 46-55.
- Castells, M., Fernández-Ardèvol, M., Qiu, J. L., & Sey, A. (2007).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ohen, E. L., & Willis, C. (2004). One Nation under Radio: Digital and Public Memory after September 11. *New Media & Society*, 6(5), 591-610.
- Eisenstein, E. L.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bson, J. J. (1977).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Mifflin.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tlin, T. (1978).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6, 205-253.
- Goody, J. & Watt, I. (1963).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 304-345.
- Greenfield, A. (2006). *Everyware: The Dawning Age of Ubiquitous Computing*. Indianapolis, IN: New Riders.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immelboim, I. (2010).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Structure of News Media: An Analysis of Hyperlinks Usage in News Web Sit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54(3), 373-390.
- Himmelboim, I., Gleave, E., & Smith, M. (2009). Discussion Catalysts in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s: Content Importers and Conversation Starter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 771-789.
- Hutchby, I. (2001). *Conversation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Telephone to the Internet*. Cambridge: Polity.
- Jackson, H.-J. (2001). *Marginalia: 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Jensen, K. B. (2008). Intermediality. In W. Donsbach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 Jensen, K. B. (2010). *Media Convergence: The Three Degrees of Network, 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Jensen, K. B. (2012).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Beyond Mass – Interpersonal and Online – Offline Divides*. In K. B. Jensen (Ed.), *A Handbook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pp. 186 – 202).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Jensen, K. B. (2013). What's Mobile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Mobil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1), 26 – 31.
- Jørgensen, K. (2007). *What are those grunts and growls over there? Computer game audio and player action*. (Ph. D.),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 Kakihara, M., & Sørensen, C. (2002, January 7 – 10). *Mobility: An Extended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Big Island, Hawai'i.
- Katz, E., & Lazarsfeld, P. F.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 Kay, A., & Goldberg, A. (1999). *Personal Dynamic Media*. In P. A. Mayer (Ed.), *Compute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 Reader* (pp. 111 – 11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7.)
- Kenix, L. J. (2009). *Blogs as Alternative*. *Journal of Computer – 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790 – 822).
- Lazarsfeld, P. F., Berelson, B., & Gaudet, H.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 Ling, R., & Donner, J. (2009). *Mobile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 Lull, J. (1980). *The Social Uses of Televis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6, 197 – 209.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 – Hill.
- Meraz, S. (2009). *Is There an Elite Hold? Traditional Media to Social Media Agenda Setting Influence in Blog Networks*. *Journal of Computer – 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 682 – 707.
- Meyrowitz, J. (1994). *Medium Theory*. In D. Crowley & D. Mitchell (Eds.),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pp. 50 – 77).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orley, 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London: Comedia.
- Ong, W.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Methuen.
-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ttegree, A. (2005). *Reform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rsua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dway, J.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Rheingold, H. (2002).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erseus.
- Rogers, E. M. (1999). *Anatomy of Two Subdiscipline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4), 618 – 631.
- Scribner, S., & Cole, M. (1981).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imonson, P., Peck, J., Craig, R. T., & Jackson, J. P. (Eds.). (2013). *The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 Slater, D. (2002).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Identity Online and Offline*. In L. Lievrouw & S. Livingstone (Eds.), *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pp. 533 – 546). London: Sage.
- Vu, H. N. N., & Gehrau, V. (2010). *Agenda Diffusion: An Integrated Model of Agenda Setting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1), 100 – 116.
-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Media of Three Degrees: Three – Step Flows of Communication

Klaus Bruhn Jensen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and studying digital media and networked communication. On the one hand , it identifies media of three different degrees: the human body enabling communication face – to – face; the technically reproduced means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gital technologies facilitating networked commun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 it addresses the multiple steps of communication that traverse the three degrees of media. Not just digital media , but mass media and embodied individuals , as well , enter into complex networked flow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ed forms of communication , it has become appropriate to move beyond the classic two – step flow model linking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 and to examine three – step flow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and across media of three degrees.

“A Compilation of Merits and Virtues of Yao Qisheng” and Yao ’ s Stories before and after His Death

Chen Zhiping

The only copy extant A Compilation of Merits and Virtues of Yao Qisheng is a set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compiled by Fujian gentry scholars during the early reign of Kangxi Emperor in the Qing dynasty to eulogize the governor – general Yao Qisheng , which preserve Yao ’ s memorials to throne or proclamations already scattered and lost. From these precious documentary materials not yet known to the public , we are able to know that Fujian governor – general Yao Qisheng was a talented official good at governance and coordination rather than a courageous general making artifices in the general ’ s tent. In many of his pre – war decisions , he made frequent mistakes and thus was kept in an awkward situation. Yao thought highly of himself without self – knowledge though he lacked the ability to strategize in a pre – war decisive manner. In addition , he was so keen on playing politics that he had bumped heads with his predecessor and successor – – navy captain general and grand coordinator , which finally led to his “death from depression and shame”.